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以北宋前期的貶謫詩為研究對象，旨在突顯北宋前期此一時間段，貶謫作品所呈現的時代特色及思想內容為何，在研究分析的過程中，所得大約如下：

北宋前期從太祖至真、仁之際是一個「儒學」回歸歷程完成之階段，並在仁宗朝達到高峰及成型，此時的政治價值、士人品格、美學範式都逐漸呈現以儒家為本位的強烈色彩，指向並統合於儒家「道」之系統下，在士風方面，北宋士大夫以「得位行道」為最高理想，「以天下為己任」的公民意識則使儒家品格在他們身上更進一步的深化，表現為積極時政、奮不顧身的參政意識；文學方面則因詩教觀念的漸次復興，「道」、「位」、「文」的關係被重新調整，「道」為知識分子生命最核心的價值，「位」與「文」隱退為行道的工具，因此士大夫不視位之得喪為生命價值之全盤崩毀，在被貶黜之後，仍多能藉著詩文或其他途徑繼續闡發「行道」的終極價值。因此北宋前期士人的貶謫心態亦有所轉變，他們不似唐人視貶謫為畏途，在政壇上時懷動輒得咎、憂讒畏譏的心理，故在貶謫時期的詩文內容上往往帶著強烈的出仕意願，帶有濃厚的論政性內容及議論性筆法。

然而隨著佛道思想不斷匯入及整合，一股新的時代思潮亦悄悄地醞釀、不斷地擴大其影響力量，這股思想潮流便是理學。理學重視「窮理」、「觀物」，其興盛代表著理性思惟已成為宋代士人內在普遍的思考模式，北宋前期理學雖尚處於萌芽階段，但理性思維仍在個別士人的詩文裡閃現，這是由於北宋對外戰爭屢屢失敗，士大夫們遂承擔起固守民族本位文化的歷史責任，並普遍追尋、確立一種可以貫通一切秩序的價值，在反省、重建自身文化的過程中，使得宋代文化漸次呈現內傾性的趨向，發展出一種理性、內斂的思惟型態，因此在探討北宋前期的貶謫詩內容時，可以隱然感受到北宋前期時代思潮的漸變軌跡。此亦促進理學在北宋中期後的興起，初期理學家如周敦頤、二程等人，

對待文藝的態度有的肯定、有的否定，但皆站在理性的角度省視文學的作用，邵雍提出「以物觀物」、「以我觀物」的命題，他重視理性、中和，反對感情對文藝創作的主導作用，對其時的文藝思潮亦有一定的影響，理性思惟的興起及儒家詩教慣常強調「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和理想，使得北宋前期詩作亦逐漸流露崇尚中和有節的美學傾向，貶謫詩作的情感表現亦受此影響，逐漸形成有別於屈原作品裡「奔放」、「激越」的表現方式，在內容上往往呈現平淡理性的情感取向。

北宋前期的貶謫詩作品在思想上亦呈現豐富的內容。其中的出處主題及時空意識顯露此時期詩人安頓自身生命的主要方式，北宋前期的士人最關注的議題為道，道的價值主宰其生命抉擇的主要趨向，因此北宋前期的士人關注、憂慮的焦點，多不在自身的因陋、而在於理想價值的無法全面實現，在時間意識方面，當貶謫詩人因時間之逝而感焦慮，其關注的焦點並不僅止於無法正視生命之終點，主要在於功業未成、而身先老朽，呈現亟欲在有限生命中自我成就的渴望。

北宋前期的貶謫詩研究可以作為北宋後期貶謫詩作的研究根基。北宋後期的政治環境、學術思潮都起了劇烈的變化，這個時期貶謫詩作則呈現更為不同的思想內容，研究重點可以著重在二個方面：第一、政治黨爭與詩作內容的結合，北宋自神宗以後黨爭日趨激烈，士人的政治心態日益痛苦與矛盾，王夫之在《宋論》裡曾批評北宋後期的士人，欲搏忠直之名，又畏禍及，多在文學裡作隱晦的譏刺與影射。這是由於前代士風的澱積，使士大夫們尚存對忠直形象的期許，然而在政治環境日趨墮壞、畏禍及身的情況下，他們詩中的議論性格惟有轉而變得隱晦，這是一個明顯不同於前期、可作為研究重點的特徵，另外由於黨爭激化亦引發貶謫事件的規模並日漸龐大，則在研究貶謫士人心態之時，亦不可忽略士人群體心理的研究。其次，則為理學之興起，理學作為宋代最主要的思潮，其影響兩宋士人心理甚鉅，亦是研究時不可遺漏的重點之一。